

莫高窟治水记

——敦煌莫高窟致力防洪和饮水升级换代

坐落在大泉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受大泉河滋养的同时，也不时受大泉河洪水的侵扰。笔者近日在莫高窟采访了解到，这里的防洪标准已由没有等级的低标准，升至百年一遇，再升为300年一遇，确保文化瑰宝不受侵害。

与此同时，莫高窟守护者的饮用水，也已经由喝大泉河的苦咸水，改喝水质好了不少的井水，如今正在进行井水置换，将喝上更高标准的城市自来水。

大泉河：莫高窟的生命之源

莫高窟在大泉河（古称宕泉）的哺育下诞生与延续。唐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途经于此，忽见金光，如见万佛，于是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开窟千年，生生不息。

如今，莫高窟仍保存有从前凉至元朝的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建造洞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有水源，而大泉河正好流经莫高窟，为开凿建造洞窟的工匠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用水。”敦煌研究院总务处处长张殿军说，大泉河的下切，为石窟开凿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同时河水为洞窟开凿和守护寺僧所用，便利的用水条件，使凿窟造像延续千年。

《唐陇右李府君修功德碑记》记载，唐朝时的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而作为饮用水源，大泉河不仅养育了各个时代的莫高窟僧人，莫高窟的现当代守护人也曾经饮用大泉水。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一次题为“莫高窟人和莫高窟精神”的讲座中说，1943年，常书鸿（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来到敦煌，准备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时，饮用水就是大泉水，冬天河水结冰，要砸冰烧化后才能取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如今，大泉水滋润着莫高窟这片小小绿洲，是莫高窟保护区绿化和改善窟区生态环境的主要水源、治沙工程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是莫高窟保护区绿化的

生命之源。

“大泉河是莫高窟的母亲河，过去吃水是大泉水，现在是灌溉林带，莫高窟这片繁荫是大泉河提供的。没有林带，风沙侵袭，就保不住洞窟，防风固沙现在是效果最明显的时候。”张殿军说。

防洪水之害：防洪标准提高至300年一遇

大泉河滋养着莫高窟，发洪水的话则对莫高窟的崖体、洞窟、壁画造成危害。莫高窟地区气候干燥，使得洞窟壁画至今保存较好。然而，当遇到较大降雨时，没有土壤和植被截蓄雨水，地表径流迅速汇聚，常常形成泛滥的洪水。

据专家介绍，大泉河洪水对莫高窟的崖体有破坏作用。历史上，莫高窟底层洞窟曾遭受洪水淹没，同时造成洞窟潮湿、壁画霉变、酥碱。

酒泉市党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邓巍说，为保护莫高窟历史文物古迹，酒泉市于1983年沿莫高窟保护区河道修建了防洪堤。由于防洪标准较低，2003年重新修建了该段堤防工程，设防

标准为百年一遇。

然而，2011年6月16日发生的特大洪水，冲毁了莫高窟文物保护单位内的防洪堤，同时洪水漫过河岸进入莫高窟牌坊及周边绿地，并进入莫高窟北区窟前低地。2012年6月4日再次发生特大洪水，大泉河洪水漫过窟前的防洪堤坝和跨河桥面，造成部分底层洞窟进水，并在窟前淤积了大量泥沙。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大泉河洪水都是威胁莫高窟安全的重大危险源之一，也是莫高窟保护面临的主要风险，2011年的洪水超过了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张殿军说。

邓巍说，根据规范要求，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物古迹，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考虑到实际发生的洪水量，2016年将莫高窟左岸重点堤防防洪标准提高到了300年一遇。

去苦水之涩：莫高窟守护人饮水升级换代

对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而言，饮水问题是苦涩的。敦煌学家

孙儒侗在《我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一文中写道：“到20世纪70年代，在现在保卫处的南面打了一口约30米的浅井，基本用上了较为清洁的井水，不再直接从大泉河里打水饮用了……有了井水后，尽管水质仍然不好，但生活上多少有了一些改进。”

一口“水质仍然不好”的浅井，无法满足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所有职工的饮水问题，赵声良说：“1984年，我去（敦煌研究院工作）也是喝那个水（大泉水），喝了就拉肚子。天天拉肚子，两个月就适应了，就成了莫高窟人了。”张殿军说，为解决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和游客生活用水问题，后来在距离莫高窟8公里处打了3口水井。大泉河的水质不适合喝，井水含碱度和矿化度依然很高。

“目前，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水务局正在做莫高窟城市自来水置换规划，用城市自来水取代井水，已经上报了方案。”张殿军说，城市自来水引进后，可以为游客提供直饮水，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的饮水条件也将进一步改善。（新华社 刘诗平）

70万『生态卫士』守护西藏绿水青山

笔者从西藏自治区政府了解到，近年来，西藏结合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加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让群众充分享受生态政策红利。据统计，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为群众提供70万个生态岗位，群众增收近40亿元。

仲夏的早晨，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保员次成塔青一早就出门了。“这个季节是藏羚羊产仔的季节，我每天早上都在保护区周围巡逻，观察野生动物，看它们是否需要救助。”次成塔青表示，“野保员这个工作很不错，不仅能为保护家乡生态环境出一份力，还有工资收入。”

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像次成塔青这样的野保员共有42名，每人每月能获得3000元收入。在他们的努力下，目前，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这得益于西藏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专项资金，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行定岗定员、定责定酬的政策。

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扎雪乡，普次仁已守护山林好几年了。普次仁说，十几年前，当地老百姓冬天取暖和生火做饭都需要烧柴，附近村民习惯上山砍树。不仅如此，在墨竹工卡县，还存在迁徙、栖居于此的黑颈鹤、马鹿等野生保护动物被偷猎现象。

由于保护区面积大，普次仁每次巡逻的时间特别长。遇见砍树的人，他会耐心劝说，还在附近的村子开展保护生态的宣传教育。遇到不听从教育劝说的，他要将其带回管护站，等待有关部门赶过来处理。

农牧民不再和大自然抢饭吃，而是吃上生态保护饭。通过参与公益林管护获得劳务收入，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发生实质改变。以前只见自行车的扎雪乡，如今每家每户都有摩托车，有些人家还开上了小轿车。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牧民成为野保员、林保员、湿地保护员，成为雪域高原的“生态卫士”，也在保护环境实现增收。

（新华社 田金文）



近年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长塘瑶族乡引导村民因地制宜，采取间作套种、林下种植等模式，大力发展迷迭香、百合、天麻等中草药种植，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特色化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图为7月13日，长塘瑶族乡老艾坪村村民在采摘迷迭香。滕治中 摄

云南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推出多项便民利民措施

新华社昆明7月13日电（记者 林碧锋）记者从7月13日举行的云南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云南着力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进一步整合优化行政复议职责和队伍，并推出“智慧复议”、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等多项便民利民措施。

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赵祖平介绍，《云南省行政复议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于2021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改革后，云南省行政复议机关由1000余个整合为150个左右，行政复议案件由省、州（市）、县（市、区）三级人民政府统一管辖，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以本级人民政府的名义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政府部门不再行使行政复议职责。

在人员整合上，琼山区将256名乡村振兴工作队员以及625名帮扶责任人全部纳入志愿服务队。发动老红军、老革命、党员干部、“最美”人物、乡贤、文艺工作者等，组建了共31000余人的志愿服务队380余支，在“公益海口”平台注册志愿者5000余人，志愿者骨干培训覆盖率达95%，实现月月有培训、周周有指导。

在阵地整合上，琼山区整合文化室、闲置教学点等资源，做到有场地、有设备、有人管，建成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集文明实践、文化沙龙、湿地科普、市民体验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明实践平台。依托区文化馆，整合党建服务中心，打造琼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总队基地，作为志愿服务组织和项目培育孵化的坚实阵地。红旗镇道崇村将闲置学校改建

通过此次改革，云南将逐步推进行政复议文书上网，进一步加强“智慧复议”建设，全面推广使用“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办案，逐步推进行政复议文书上网公开，增强行政复议工作透明度；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文书送达机制，综合运用邮政快递、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行政复议文书，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行政

复议活动。

此外，云南还将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设立行政复议代办点，代办点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转送县级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办理，让人民群众少跑路也能通过行政复议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在工作整合上，琼山区坚持“共建共享、相融互促”原则，以“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为主线，找准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基层党建、社区治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人居环境、垃圾分类等工作的契合点，融合统筹推进，充分释放基层活力，既破解基层治理之困，又实现志愿服务常态长效，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成实践站，打造全省首个全竹结构大礼堂，围绕乡愁主题打造“五乡”文化室；龙塘镇博抚村挖掘珠崖郡历史和潭口第一枪红色资源打造特色实践站。

全国体教融合工作座谈会7月13日在青岛举行。会议传递出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我国体教融合工作已经初步取得成效。

学校体育大有起色

最近几年，我国学校体育工作持续发力，如今已经广泛显现成果。

教育部在全国体教融合工作座谈会上公布了振奋人心的数字和信息：“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体育教师近10万人；2020年，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总数突破70万人，学校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为92.8%，体育器械配备达标率为96.8%；今年年初完成的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总体改善，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身体形态发育指标持续向好，肺活量水平全面上升，中小學生身体素质出现好转。

一些地方探索出了可供借鉴的学校体育发展模式。比如，上海推行“小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高中体育专项化、大学体育个性化”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推动义务教育学校至少开设7种以上运动项目，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引导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锻炼一小时，实现学生人人会游泳、熟练掌握至少两门运动技能。青岛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30万名学生不出校园就能参加足球、棒垒球、武术、击剑等专业项目培训。

专业体育教练员和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

体教融合工作推动一大批高水平体育教练员和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带教带训，让普通学生也能接受专业的体育训练。

据介绍，目前辽宁全省大中小学聘请1760名职业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有效解决了体育教师专项技能不强不精的问题。

2020年，共有386名退役运动员进入天津各类学校从事体育教学工作。山东省在全省大中小学增设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推动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进入学校教学。

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协同推进体育设施共建共享，是体教融合的有力推手。上海在此方面的措施得力，已经全面实施大中小学室外体育场所课后、周末和暑期向社区免费开放，基本实现了应开尽开。所有公共体育场馆也实现向青少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为学生就近锻炼提供方便。

福建全省公共体育设施已经全部免费或低收费向青少年开放，并正在推动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目前，厦门市符合开放条件的117所学校中，已经开放88所，其余学校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实现开放。

探索体教赛事融合

赛事体系融合，被认为是体教融合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一个难点。目前，一些地方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

比如，上海市由体育局、市教委合作举办的上海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今年共吸引4570支队伍、18000余人报名参赛，已经成为深受青少年喜爱、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2021年，福建省教育厅联合体育局已组织举办12个大型比赛。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全国体教融合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教育部门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方面下了功夫，体育部门也在因地制宜组织体校教练、组织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入学校，双方都在共同努力。

（新华社 马邦杰 王凯）

数字显示我国体教融合初见成效